

老坚决集

LAO JIAN JUE JI

张庆田 著



封面设计：张 庚

封面、扉页画：韩 羽

礼花文学创作丛书

老 坚 决 集

张 庆 田 著

*

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

*

1980年1月第1版

1980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700

统一书号 10086·485 定价 0.80 元

《老坚决集》小序

——兼答××同志

××同志：

你来信说：“记得上中学的时候，我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曾欣喜地从《河北文学》上读到您的小说《“老坚决”外传》。当时印象极深，思想深刻、艺术纯熟，民族风格，喜闻乐见。（说实话，你这些话说得太过了，这篇东西在思想和艺术上，都有许多败笔）我不只看了一遍，觉得是不可多得的作品。十几年来，这篇文章却遭了厄运，挨了不少棍子和帽子，我总觉得十分不平。不久以前我又找来小说重读，觉得所写的主题，在今天也是很有意义的……”你在信中还问道：“这篇小说是在什么情况下写成的？”“小说写成后受到哪些诬蔑？”“您后来写过的检查是怎么回事？您对此有何新的认识？”“关于给周总理写信的事，是否实有其事？”特别提到“这样安排情节，并不损害周总理形象”。你所提的这一系列问题，我愿在编选这个集子前，加以说明。

这本集子所以叫《老坚决集》是因为收进了《“老坚决”外传》、《“老坚决”新传》、《“老坚决”列传》以及被当作中间人物批判了的《对手》。

《“老坚决”外传》写于一九六二年，但孕育在一九五六年。一九五六年我发过一篇通讯，题目叫做《“老坚决”的路走对了》。我从一九五二年到一九六〇年，长期在一个村蹲点，经历了从二十户的初级社到一千六百户的高级社和万户的人民公社。既参加了大跃进运动，对“五风”也有亲身的感受，有些情节都是来自实事。如篱笆化，绞关化，插黑旗……对于这些事情我当时也不十分清醒，我当时还是县委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王大炮的影子也有自己的影子。直到一九六〇年和一九六一年，我到—一个地区参加了整风整社，对“五风”的危害才有了深刻的体会。由于高征购，这个地区打下粮食来不进家就交了公粮，农民没有粮食吃，啃地里的青玉米，吃生豌豆花；由于盲目施工，在兴修水利时，破坏了生产力，造成了当地没有隔宿之粮的景况。当时，上级每天用汽车往回运返销粮，派来医疗队员昼夜抢救病号；我们的工作队员，男的浮肿，女的闭经……回到机关，又住了一期党校，对“五风”的危害，才有了更深刻的认识。一九六二年，我们在保定召开了短篇小说座谈会，由康濯同志主持，请《文艺报》副主编侯金镜同志及作家艾芜同志和路过的魏巍同志在会上发了言，我受了一些启示，会后，我重新到以前蹲点的那个村庄去了一趟，很快就写出了《“老坚决”外传》。写好后，曾寄给侯金镜同志，并附了一封短信，大意是：“这篇东西是受了你的启示写成的，你看是不是到了‘边缘’？”他回信给予鼓励，大意是：“没有问题，又有六十条为据。”后来，他在大连会议上曾提到这篇小说。据出席大连会议的康濯同志回来说，茅盾同志，赵树理同志都谈到它，说

它“投鼠没有伤器。”作品发表了两年，读者还是欢迎它的。可是到了一九六四年，大连会议被否定了，《文艺报》公布《关于“写中间人物”的材料》时，《“老坚决”外传》被点出来了，我抄一段给你：

他说（指邵荃麟同志）“总的看来（我们的创作）革命性都很强，而在反映现实的深度、长期性、复杂性看来，感到不够；表现在人物创作上，比较单纯；单纯化反映在性格描写上。这说明了我们的作品革命性高，现实性不足。《“老坚决”外传》这个作品在地方刊物上还是应该肯定。有教育作用。缺点是人物性格单纯化，主人名副其实，处处坚决；另一人物王大炮更加单纯化。短篇小说很短，只能强调人物的一点，但这个作品使人感到单纯化，作品中提出问题到解决问题很快，没有反映出人物性格的复杂性”。

你怎样理解这段话呢？我个人理解邵荃麟同志是批评这篇作品写的性格单纯化，没有写出人物性格的复杂性来。而且是当成“革命性强，反映现实的深度、长期性、复杂性不够”来举例的。这是主要的方面。可是同年《文艺报》发表了一篇署名文章，批判我的短篇小说《对手》，在文章中却有意地谈到了《“老坚决”外传》。文章有这样一段话，也把它抄出，供你对照欣赏：

“《“老坚决”外传》（按应是《“老坚决”外传》

• 3 •

中的老坚决)绝不是拥护三面红旗,坚决为社会主义革命事业而奋斗的无产阶级英雄人物,而是相反。这篇小说在一九六二年八月中国作家协会召开的农村题材短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上得到了‘写中间人物’主张的邵荃麟同志的称赞,不是偶然的。时隔二年,在开始批判‘写中间人物’的错误主张,批判创作上的‘非英雄化’倾向的时候,张庆田同志又发表了《对手》这样的小说。客观事实不能不使人产生这样的疑问:作者对‘写中间人物’这类主张,究竟抱有怎样的看法?同时,我们想到,对于象张庆田同志这样比较经常生活在农村中的作者来说,究竟是以什么样的态度参加群众斗争。用什么样的立场、观点、方法反映这个斗争?看来,这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

你将前后两段话对照一下,就可以看出是怎么一回事了。邵荃麟同志明明是批评了这个作品,这篇文章却说成是“称赞”,而且引伸到我的态度、立场、观点、方法等一系列的问题。至于对《对手》的批判,你再读它一遍就明白了,我所表达的主题思想是想反映下乡知识青年不要为荣誉迷住了眼睛,批评者却指责,《对手》写了什么样的英雄?对于此,我只想打个比喻:一个画家画了一匹马,我们的批评家却说:“你这是画的一头什么样的驴!”

据说作家协会内部还列了一张名单,一类作品列入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一类列为中间人物。而我的《“老坚决”外传》却被列为“动摇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

的“中间人物”。当时，我正主持《河北文学》。据说，《文艺报》发批判文章，是征求了当地党委的意见的。当时的党委怎能表示不同意发呢，因此，我除去在机关接受“帮助”外，还奉命转载《文艺报》的文章和组织对那两篇作品的批判文章。又奉命写了检查，公开发表。你也许问，现在也有的同志说：“你不检查就好了！”那时，我认为让我检查是对我的保护，是当成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我是对领导抱着感激之情的。检查后，我就离开编辑部去参加“四清”。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河北日报》首先发文章点了康濯、李满天和我的名字。关于文化大革命当中的一些批判过程，我已在《新传》的“缘起”中加以说明，这里不再赘述。不过有关给周总理写信的那个情节，在生活中却是真有其事，那是一个驻村技术干部，他的名字叫刘建文，他的信还真起了作用，写信前，中央电台只发布灾害性的天气预报，后来，就每天预报天气了。当时，收到国务院的复信后，我很受感动，随手拈来，写进了《外传》。关于有关画家的一段话，是应画家之托写进去的。

一声春雷，“四人帮”倒台了！

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双百”方针正在得到贯彻，党的各项政策正在落实，《“老坚决”外传》、《对手》等作品也得到重新评价。写这些话似乎有点多余，不过，我觉得这不是一个人、一件作品的问题，是涉及到如何进行文艺批评的问题。目前正在总结经验，这些多余的话，也可以为总结经验提供点资料吧！

最后，我还得再说《“老坚决”外传》包括《新传》并不

是象您以及某些同志来信中所说的那样好，也不象某些同志所说的是我所写的小说中最好的。我有自知之明。从我本身来说，我并不喜欢这类作品。也许有的同志要问，那为什么还要写呢？我的回答是生活推动了我，当生活孕育在你的头脑中，形成了胚胎时，它会使你坐立不安，而且阵阵胎动在折磨着你，除非流产，就得分娩，从这一点来说，创作也不以作者的意志为转移，而总是受生活的制约。

目前为什么揭批“四人帮”的作品比较多，而且反映这么强烈，这是因为“四人帮”对我们的残酷迫害造成的，是客观现实的反映。从这一点使我联想到创作活动本身是否也有它的规律？为什么这个时期反映这样的生活的作品占主导地位，为什么那一个时期反映那样生活的作品占主导地位？这是社会生活起决定作用。离开现实生活去指挥创作，提出写什么不写什么，是否有点“瞎指挥！”正确的指导，是否应根据其客观规律加以引导？我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促使创作的繁荣，否则，只能干预创作，产生不良的后果，难道这样的教训还少吗？

既然，创作是受生活所制约的，因此，我们评介作品时，也应当根据当时的客观生活来研究分析作品，我们不能按照某种气候不做具体分析地对待事物；更不喜欢一边倒的、看风使舵的文艺批评。譬如，往往某报刊发表了一篇批评某作家的文章，于是其它报刊争相效尤，形成一种破鼓乱人捶、墙倒众人推的局面；过一阵子，又翻过来再来一个一边倒。为什么很少出现争鸣的局面？这里借用批评家的一句话：“看来，这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

另一方面，我希望读者和批评家在评论作品时，不要把

作品中的人物和生活中的人物对号。小说就是小说，作品中的“老坚决”绝不等于生活中的“老坚决”，作品中的小D也决不是生活中的“小D”，它是一种社会现象的概括。另外，也希望批评家今后要高抬贵手，在批评作品时，不要轻易地否定一个人的立场、观点、世界观。一个人的立场、观点、世界观如何，要由组织上根据其一贯表现来鉴定，依一篇作品定人罪名，不能说没有打棍子的味道。

我写这些，并不是责怪批评家，坦白地说，批评我的人，我们还成了朋友。我认为作家、批评家读者都是人，都不是生活在真空中，很难说不受某些“空气”的影响，何况，有些批评文章往往是奉命之作，就象我主持刊物时，组织文章批评自己一样，都是不得已而为之。作家，批评家也不过彼此彼此而已。

写此文时，和《外传》有牵连的侯金镜同志，邵荃麟同志，赵树理同志，以及千方百计保护我的远千里同志都被“四人帮”抛出的“文艺黑线专政论”迫害而死，我谨向他们致哀！也向那些因《外传》而受到牵连的同志们致歉！

过去的由它过去，团结起来向前看，让我们在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征途中，互勉互进，在不同的岗位上做出新的贡献！

这个回答，不知你是否满意？

敬礼。

张庆田

1979.5.9

目 次

《老坚决集》小序·····	(1)
“老坚决”外传·····	(1)
“老坚决”新传·····	(22)
“老坚决”列传·····	(47)
山路·····	(64)
运输队长·····	(88)
磨镰·····	(103)
好老秦·····	(110)
盐湖夺油记 (评话) ·····	(122)
信·····	(140)
赵玉瑛日记·····	(167)
对手·····	(188)
并蒂莲·····	(201)
红砖·····	(217)
小亮子·····	(230)

杜里的孩子们.....	(245)
唐小澍.....	(254)
一杆红缨枪（诗体小说）	(261)
秋山红叶.....	(280)
后记.....	(360)

“老坚决”外传

为什么叫“老坚决”

“老坚决”姓甄单名一个仁字。太行山下，界河河旁，界南村人。提起老坚决这个名字来，倒有大家所熟悉的一段故事：一九四一年，日本鬼子包围了界南村，把群众赶到观音庙门口，威逼大家交出八路军的区长来。眼瞅着，杀死了刘小娃的爷爷刘老汉，挑死了赵寡妇的独生子赵志强，又扯出了孕妇李二嫂……甄仁蓦地窜出了人群，大喊一声：“我是区长！”

“我是区长！”

“我是区长！”

群众象暴发了的山洪向日本鬼子冲去。

哒！哒！鬼子的机枪响了，又一批人倒下去。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甄仁大声喊着，挺着胸脯，随敌人走去。

初春的天气，刚发了一场桃花水，看看来到界河桥上，只听轰的一声地雷，大桥飞上天空。在硝烟中，甄仁踹翻了一个鬼子，纵身跳下河去，被真区长张亮领游击队员救上了

太行山。从此，沿着界河又出现了一支撼太行、震平原的“抗日救国，保家复仇大队”，大队长就是这位虎口余生的甄仁。

一九四二年，日本鬼子为了割断山区和平原的联系，一直把炮楼修上界南村的西山老虎崖。界南村的人民，在甄仁的领导下，拔锅卷席，牵驴抱鸡躲进了西沟，与敌人对峙，鬼子拆平了他们的房子，他们在南坡上挖起了窑洞；鬼子挖起了封锁沟，不让一粒盐进山，他们一夜填平了村里的水井，不让鬼子吃水。春天，甄仁领人马封锁了炮楼，播下了金黄的种子；秋天，他们一手拿枪，一手拿镰，收回了沉甸甸的谷子。一年三百六十天，三年如一日，终于困走了鬼子，重整家园。

界南村改名新村。拆了炮楼盖新房，挖出旧井灌园地，抗日民主政府奖给了他们一面红旗，并选派甄仁出席了边区召开的群英大会。在会上，边区政府的首长拉着甄仁的手说：“你们真坚决！”

一九四五年，日本鬼子投降了，万民欢腾。甄仁却因为几年来的风宿雨露，饥饱劳累，得了一个古怪的病儿，能坐不能立，手能动，腿不听话，西医说是关节炎，中医说是半身瘫痪。吃药、打针，中西医结合，就是不顶事。甄仁一怒，自言自语地说：“妈的，难道你比日本鬼子的炮楼还难摆治！”他闭门谢客，从一个老中医那里借了一本《本草》，凭着他那些一知半解的文墨，豁着他那两条腿，搞开了试验，这味药不行，另换一味，他想，神农氏尝百草治民疾病，我不信我这腿就这么顽固。说起来也奇怪，一连几年，他不声不响地把

腿治好了，正好赶上参加一九四九年天安门的开国大典。人们拿这件事当成了奇闻，一说起来便是：“人家那人，真坚决！”

甄仁从北京回来，头一件事便是搞互助组。打拳头三脚难踢，闹互助也不那么容易。别人搞互助是兵对兵、将对将，有骡子的找有马的。甄仁呢，单找了这么两户，一个是被日本鬼子杀死的刘老汉的孙子刘小娃，另一个是被日本鬼子用刺刀挑死了独生子的赵寡妇。一个是孤儿，一个是寡女，再加上他这个单身汉，就这么互助起来。当时，人们还给他们编了两段快板，说是表扬他们，还不如说是嘲笑他们：

老坚决，真能干。
互助组，一对半。
孤儿拉着梢，
老坚决扛着耜，
寡妇扶犁闹了一身汗。

金真不怕火炼，树大不怕风摇。那些兵对兵将对将的互助组，真是春合、夏吵、秋散伙。一发生纠纷，还得请老坚决去给他们调解。到了秋后，全村的互助组就剩下他们这一根根了，人们又说：“还是老坚决，坚决！”

甄仁问刘小娃道：“娃啊！你说，咱们的互助组怎么散不了哇？”小娃这时已有十五六岁了，长得细马单筋的，看上去也不过十二三岁，他眨了眨两只小眼说：“你待我比亲爹还

亲，她疼我比亲娘还疼，你们要不收留我，别说种地，连吃饭穿衣还得靠政府救济……”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赵寡妇的脸腾地一下子红了。甄仁连忙把话岔开道：“你也没吃闲饭哪！咱们是人心换人心，八两换半斤。那几年，我这腿有病还不是靠你俩照顾！”赵寡妇说：“鱼帮水，水帮鱼，穷人帮的是穷人。人家那大骡子大马的，独车自牛的，使儿唤妇的人家，恨不得冒个大尖尖，还互的什么助？”甄仁欢喜地一拍大腿说：“上级叫总结经验，我看这经验让你俩说着了！其实，上级早就说得挺明白：一要自愿，二要互利。谁最自愿？还不是咱这缺胳膊少腿的贫农！”

收完了秋，三个人倒发了愁。小娃说：“这么多的粮食，我放在炕上怕喂老鼠，干脆，你给我管着吧！”赵寡妇说：“仨灶费柴，俩锅费米，咱们一股脑儿三口人，一个烟筒冒烟还不行！”甄仁想了想说：“别叫人家说咱是吃大锅饭哪！”赵寡妇说：“洋鬼子把刀搁在你脖子里，你都没怕过，这会倒三心二意了，你愿意，我愿意，他愿意，谁能来砸咱们的锅？”小娃把舌头一吐，调皮地说：“再说咱们的锅也不大呀！”甄仁把腿一拍说：“好，咱实行民主！”

谁知这样一来，果然招了一场风波，一些好事的人，又给他们编了一段快板：

互助组，真不离（儿）。
仨人拧成一孤堆（儿）；
一块儿干，一块儿吃（儿），
就差没有一块儿住（儿）！

这一下，甄仁可真要发脾气，赵寡妇却接过来：“身正不怕影儿斜，别说咱没一块儿住，咱就是明铺夜盖地在一块儿滚，也不过只差一张结婚证。”小娃说：“这话不当出在我嘴里，你俩早就该去登记！”赵寡妇噗地一口笑了：“那有当儿子的给爹妈当介绍人！”小娃把舌头一吐：“新事新办吆！”赵寡妇把眼一瞪说：“人家还不知怎么打算呢？”

“我实行民主！”

第二天，他俩就领到了结婚证。人们又说：“人家那人，就是坚决！”

结了婚，三家并成一户，互助组自然拆了台。重打锣鼓吧，一插招军旗，就进来了五户贫农。一九五二年他们就办起来一个二十多户的初级社。这一下象骏马生翅来了个大飞跃。要把这些都写上，也要来一部《创业史》。我只能告诉大家，这个初级社一九五四年发展成一个四百多户的独村社，到了一九五六年又转成一个一千五百多户的联村高级社，一九五八年又升成了人民公社。甄仁成了办社的旗帜，被选做人民代表，只要一提甄仁，人们便说：“人家那人，真行，老坚决！”

从此，“老坚决”的名字越来越响亮了。可是近几年来，老坚决这个代号却有了不同的含意，有些人把它和老保守、老顽固、老……联在一起了，为了辨明是非，作传记的人，只好做一番调查研究。下面便是一篇调查记录：

小青年的牢骚

我到了县里，县委书记不在，县长也不在，农村工作部长不在，农林局长也不在，大家都忙着检查生产去了。农村工作部的小刘接待了我。他一听我是到新村去访问老坚决的，把脖子拧了半匝，一撇嘴说：“那老家伙，可难办哩！”

“怎么的？”

“你去了就知道了，真坚决得叫你受不了！”

“你说说好吗？”

“我早就想说呢！”他把我推到椅子上，顺手牵过一只凳子，滔滔不绝地说起来，“你就说那年吧，人家别的村都是黑夜白日鏖战，白天红旗飘，夜晚红灯照，闹得轰轰烈烈。他呢，仍然象火车站上的电表一样，的的得得，不紧不慢地使你焦心。公社才开了紧急电话会议，让他把所有的劳力都调到丰产路上去锄草，他却叼着烟袋吸了一锅又一锅，把主要劳力都调去栽白薯。

“我说：‘你不执行上级命令。’

“他说：‘白薯秧子剪下来，能让他烂掉？’

“公社提出来要美化小麦，实现篱笆化……”

“什么叫篱笆化呀？”我莫名其妙地打断了他的谈话。

“就是在小麦地周围，用树枝编一道篱笆墙嘛！”

“编那个干么？”

“美化嘛，防止鸡刨狗闹的！”小刘接着说，“这一回我多了个心眼，私下里发动了一批小青年，有他那个外来的小